



大 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0 March 2002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六委员会

第 13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0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勒隆先生.....（海地）

目录

议程项目 162：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
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下午 3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62: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续）（A/56/10 和 Corr.1）

1. **Winkler 先生**（奥地利）说，他欢迎国际法委员会通过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及其就这些条款向大会提出的建议（A/56/10，第 72 和 73 段）。

2. 奥地利代表团完全支持委员会建议采取的办法。它重申应将条款草案作为决议的一部分予以通过，以使它们成为一项非约束性的法律文书，但不排除在以后阶段为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专题的公约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可能性。此外，将条款草案作为大会决议附件予以通过，就可以根据国家实践检验这些条款是否适用。召开国际会议以所取得的经验为依据，可能对它的工作有益；如果不是召开国际会议，这些条款可作为国家责任行为守则，但须为国家实践所认可。

3. 最近的事件表明，国家责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它同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的原则密切相关，或许是国际法中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行为守则是加强国家责任法的最佳手段，但在短期内有可能发生偏差，或许还必须容忍这种情况。

4. 除了书面说明规则外，行为守则具有一种教育功能，因为它有助于在习惯法编纂规则方面加强法律意见。它也是促进法律逐步发展的一项有效手段，编纂国际法各个部分所采取的方式就表明了这一点。

5. 奥地利代表团认为，从长远角度讲，认识到行为守则的公正性，有助于该守则为人们所接受，

并会导致调整有关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提到的行为。在现阶段，大会和国际社会应该设法使各国相信，明确的规则对违犯行为的受害者和被指控的犯法者都有利，因为条款草案力求权衡两种合法利益，一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在寻求其权利方面所应享有的合法利益，二是在避免对被指控的犯法者随意提出过分的或羞辱性的要求方面，使这些人也能享受合法利益。

6. 奥地利注意到某些代表团对缺少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表示遗憾，但它认为，根据将该案文作为一项决议附件的建议，这一省略是必要的。

7.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委员会通过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条款草案，这是在制订该领域国际法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奥地利一直对编纂和逐渐发展关于预防越境损害的国际法给予优先考虑。他回忆说，奥地利和欧洲共同体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预防损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8. 条款草案对国际社会极其重要。奥地利大力支持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制订一项公约的建议，并确信这项公约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奥地利对整个案文感到满意，并希望大会采纳委员会的建议，不过，它仍要对某些条款草案发表一些意见。

9. 关于第 1 条（范围），他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一语是否合适提出了疑问，因为国际法禁止的活动属于国际法其他规则的范围。第 3 条与第 10 条的关系需要澄清，这两条中列举的一些因素用来确定是否可以开展某项活动。或许人们想了解该如何根据第 3 条考虑这些因素，以确定一国是否按该规定履行了它的义务。奥地利代表团还认为，第 5

条的措词应该更清楚地说明，各国负有义务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任何拖延都是不适当的。它支持第 9 和 10 条中所表述的观点，并认为，有关各国负有义务“就预防措施进行协商”，并考虑“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各种因素”这对尽可能预防跨境损害至关重要。第 9 条第 3 款载有一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规定。第 18 条（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的评注明确说明，各国根据该条所承担的义务旨在扩大两者的范围，纳入特定适用的规则及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则。必须全面审查这一规定对实施条款草案的影响，奥地利仍然愿意接受对第 18 条的任何讨论。

10. 关于第六章的主题（对条约的保留），奥地利代表团认为，准则草案 2.2.3（条约明文规定可在签署时提具的保留）旨在构成准则 2.2.1（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中所载的总则的一个例外；它对关于确认保留和如何解释这些确认的国家惯例是否可靠提出疑问。奥地利代表团忆及了准则 2.3.1（过时提具保留）和准则 2.3.2（接受过时提具保留）的措词，同时十分担心这种准则会使整个条约保留制度也适用于所谓的过时保留，过时保留不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所载的保留定义。国际法委员会本身已给保留下了定义，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不违背《维也纳公约》，它所下的定义明确提到了可以作出保留的精确时间，而没有对“过时”保留的情况作出规定。其后果是，即使这被称作“保留”，过时保留实际上依然是一种与真正保留不同的声明，应该将它们区分开。当然，某一项条约的缔约国总有可能同意把保留制度应用于有关该条约的“过时”保留，但是不符合严格保留定义的声明不应被认为是保留。在条款草案中提议的办法有可能损害“条约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而适用“过时保留”制度，则会导致建立一种条约修正

制度，这与《维也纳公约》第 39 至第 41 条是相违背的。

11. 奥地利代表团还想知道关于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是否与《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相一致。此外，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这一概念似乎相当含糊，奥地利代表团怀疑单独予以处理是否有益。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具有与保留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国家提具时，它对条约的有关承诺会引起疑问。奥地利代表团不赞成采用“解释性声明”之类的声明，但是在保留方面若能涉及此概念，它愿意促进澄清这个概念。

12. 他在最后提到，国际法委员会决定任命两名特别报告员，负责长期工作方案的五个专题中的两个专题。虽然这表明奥地利十分关心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和共有自然资源的问题，但其代表团仍请委员会阐明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内容。

13. **Leanza 先生**（意大利）注意到，对以前条款草案进行的最重要的修改，往往在于改进草案的结构和阐明诸如越权行为等某些基本标准。对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说明虽然改变了措词，但是非常及时。可特别提一下第 25 条第 1 款(b)，在此处，“整个国家之国际社会”这个词语已代之以“整个国际社会”，以便对两类社会作出区分，一类是《维也纳公约》中提到的国家社会，它把国家视作参与制订国际法律规范的机构，另一类是国际社会，这是不完全属于国家的一类机构。

14. 意大利代表团就国家对不法行为的责任这一概念和国际罪行与国际违法行为之间的区别重申了它的立场。习惯国际法已经规定，违反为保护国际社会利益而规定的某些义务，是对所有国家主观

权利的直接侵犯，并使它们有权援引违反了国际法院称为对所有人的义务的那类义务的国家的责任。由于全部通过条款草案是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意大利代表团已接受委员会提出的折中方案，其中要求删除“罪行”一词，并保留一套具体条例的基本内容，但它不同意第 40 条中对严重违背一词新下的定义。不过，必须阐明所有人的义务、强制性规范和国家所犯国际罪行之间的复杂区别，因为委员会在通过第 40 条的新措辞时，似乎在扩大严重不法行为的类别，这个类别同包括国际罪行的类别相似。

15. 他忆及了能将严重违背义务的行为与其他类型的违背行为（即违背义务的性质和违反的程度）区分开的两个标准，他强调，委员会就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和违反程度的概念建议使用的措词不确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载有一项强制性法律的重复定义，法律原则和判例力求把这项定义解释为一个守则框架，用于禁止某些行为，这些行为由于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存以及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而被视为不可容忍。根据这项一般定义，禁止侵略、酷刑、奴役、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等的守则被认为是强制性的。违背的程度必须根据有关公然或蓄意违背由一项强制性规范产生的国际义务的概念来评估。然而，这种评估可能会引起各种分歧，从而使第 40 条的适用复杂化。

16. 意大利代表团认为，第 41 条的规定（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总的说来可以接受，虽然它们具有折中性，而且必须根据情况逐一明确说明。在第 41 条中提到的义务是对所有人的义务，将酌情适用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

17. 意大利政府完全支持委员会对第三部分第一章（一国责任的援引）所作的修改，并赞同委员

会关于在第二章中取消对反措施与临时反措施的区分的决定。第 54 条的措词（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受害国以外的一国可以对不法行为责任国采取的措施而言，它作出了消除这方面分歧的决定。意大利不反对列入一条保留条款，即使它会扩大这项规定的范围。

18. 意大利政府不赞成将条款草案变成一项国际公约，因为这样做，需要举行国家间谈判，并且会延迟，甚至妨碍该案文的通过。无约束力的文书较为可取，大会可通过一项提请各国注意该条款草案的决议。但是，一个国家批准该草案，并不意味着它确信其中的所有规则都符合习惯国际法，而且以后审议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可以采取该方式。

19. Dinstein 先生（以色列）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即大会应该注意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并将它们作为决议附件。在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将最后案文改为一项条约之前。应该广泛散发最后案文，以便通过国际理论和实践的严格检验，并获得学者和法院的认可。。

20. 条款草案主要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内容，它的优点在于能使这些内容更加明确。遗憾的是，若干规定只限于适用法律的基本原理，但有一句至理名言说得好，“难就难在细节上”。在某些情况下，如在第 44 条所涉提出国籍要求和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情况下，委员会将研究有关细节。缺漏的细节若不是进一步编纂的主题，就会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产生。有两项条款属于这种情况，即没有确定国际补偿标准的第 36 条，以及没有涉及因通货膨胀而调整有关利率问题的第 38 条。

21. 意大利代表团已经表示了它对某些规定的

关注，并对条款草案没有阐明强制法有争议的范围和对所有人的义务的范围感到遗憾。虽然评注较详细地论述了定义问题，但是意大利代表团与特别报告员不同，之不相信强制法与后者列举的规范相一致。在法律文献中，往往倾向于将强制法所及范围扩展到一系列日益增加的国际法规则，因此，或许现在就该考虑应在多大程度上编列国际法规则。显然，在强制法的范围成问题的情况下，笼统提及严重违背行为的必然后果，可能证明是不适当的，如果过分扩大强制法的范围，则在比如说种族灭绝必然造成各种后果的情况下，笼统提及这些后果可能证明是完全不适当的。正如芬兰代表以北欧国家名义所申明的，就严重违背强制法和严重违背对所有人的义务这两种行为而言，存在一种双重结果制度，这可能会导致滥用此制度，而且不符合习惯国际法。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或许基于：有关“罪行”和“违法行为”的争论对条款草案案文仍然具有影响这一事实。

22. 由于条款草案不是作为一项条约制订的，因此作出不规定解决争端机制的规定受到欢迎。国家责任法由次级规组成，这些规则对国际法的初级规则具有某种影响。如果解决争端机制适用于所有因国家责任方面的分歧而产生的争端，则这种机制可能具有抑制几乎所有国家间争端的作用，但大多数国家不会自愿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更加合理而稳妥的办法是，分别根据规定了国际法某个方面初级规则的各项文书，具体处理强制性解决争端的问题。

23. **Fomba 先生**（马里）指出，国家责任的问题是国际法核心，他说，条款草案的重要目的是要更好地反映国际法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家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促进增强国际社会作为一支活跃力量的能见度，申明提高国家行为道德的原则以及消除

与国家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有关的各种弊端的必要性，并使国际法能够更加具体地发挥社会协调职能。花了 40 多年时间起草的案文，无疑吸取了精深的知识和专门知识，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

24. 关于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义务的问题，马里代表团认为这个专题很有意义，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国际社会是一支有影响的力量，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壮大需要遵守基本的规范，而不是背离这些规范。马里代表团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共同立场是，应该在两个条件下保留这一章：删除关于反映违背行为严重性的损害的第 42 条第 1 款，并用“强制性规范”这一措词代替“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和保护其基本利益的必要性”一语。在这方面，马里代表团支持第三章的基本观点，并赞成坚持此观点。它认为，删除第 42 条第 1 款是恰当的，因为保留它只会造成，而不会解决困难，它支持用来证实强制性规范这个概念更为可取的论点，尽管此概念的内容有问题；它对于某些轻微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表示保留。关于进一步审议某些方面严重违背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马里代表团基本上认为，第 41 条现有措词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某些方面应该澄清，例如“不得协助或援助”的义务或“进一步的后果”一语的范围，不过，案文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在结果和手段两个方面，应更多地强调结果，同时不应影响随后在如附件或议定书中明确规定程序性行为规则的可取性。关于限定对该章实际涉及的情况的适用范围问题，现有案文文本似乎并没有引起任何特殊的关注。应该使第 41 条、第 48 条和第 54 条更加一致。

25. 马里代表团没有对诉诸反措施的权利提出异议，它认为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必须作出限

制滥用行为的充分保证。它指出，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国际法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三类分歧意见：一类主张完整保留这一章，另一类希望对这一章加以改进，还有一类赞成完全删除这一章。但是，马里代表团一直没有时间深入考虑为支持各种立场所提出的论据。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所采取的反措施问题（第 54 条），在国际法委员会也引起了意见分歧。在这方面，委员会的结论主要是讲技术性的修改或再修改，这似乎没有造成任何特殊的困难。

26. 关于第二章的整个结构，马里代表团对如下事实表示欢迎，即介绍反措施的作用，是为了引导人们尊重初级义务，而不是着眼于惩罚。按第 49 和第 50 条中的设想，限制反措施在时间上和就事而言的范围，这对提供有效的保护，防止固有的危险显然十分重要，不过应努力遵守国际法的主要规定。相称原则在协调武力关系，因此也是因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第 2 条中规定的渐进程序性预防措施，是在武力关系中实现和解的系统性努力之一。然而，需要用来维护一受害国权利的紧急反措施应确实具有保护性质。此外，如果不法行为已经停止，或者争端正待一个强制性解决争端机构加以解决，终止反措施而无不适当的拖延，正是反措施发挥有效作用的必然结果。不真心诚意地执行解决争端程序的例外情况似乎是明显存在的。一旦责任国履行了义务，就应自动终止反措施（第 53 条）这项规则要求各国，特别是强国提高警觉，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27. 关于争端解决规定问题，马里代表团接受该理论提出者现正审议的报告第 57 段中所阐述的论点。第 50 和第 52 条的现有案文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精神和文字，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主要是任择性和渐进的程序性制度。不过，马里代

表团对明智的办法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将按此办法，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并提请人们注意它在 1996 年建立的解决争端机制，这个机制提供了实际好处。关于责任问题有三种选择：维持现状，换言之，足以习惯国际法为参照；正式重申该法的实质；建议按照 1996 年机制的路子创建特殊机制。在此阶段，马里代表团尚未确定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28. 原则上，条款草案应该采取公约的形式，如果不能这样做，就应执行委员会关于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建议，这首先需要注意决议中的条款草案，并将案文作为决议附件。这项程序的实际好处在于，它使各国，特别是小国能有时间对条款草案进行更加充分的评价，条款草案对和平处理国际关系和使国际法民主化至关重要，不过，不能将它们用作放弃该倡议的借口，另外，还应考虑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审查条款草案，以便订立一项公约，并同时处理解决争端的问题。

29. 他完全理解摩洛哥代表特别对条款草案的基本政治选择所表示的关注。马里代表团仍然赞同以下建议，即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或工作组，通过作出最后政治决定，来完成此过程。

30. Czaplinski 先生（波兰）说，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是一个十分均衡的折中方案，要提出能为所有国家所接受的修正条款极其困难。此外，列入条款草案的保留条款为卷入特定国际法律争端的有关国家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条款草案的评注精深详尽对条款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作了答复。

31. 然而，波兰代表团仍要提出若干问题。如第 5 和第 9 条中提出的、把非国家实体的行为归于一国的问题不够清楚。第二章中使用的控制、指挥

和指使等概念应该在评注中加以澄清。另外，波兰代表团欢迎明确阐明国家对准国家组织或机构的活动所负的责任，这有助于根据国际法履行事实上的制度的责任。

32. 波兰代表团不完全认为分别在第24和第25条中对危难和危急情况所作的区分合情合理的并应列入条款草案。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非常相似，对它们作出区分为独断的管制提供了便利。关于利息问题的第38条也是如此。波兰代表团认为保持第24条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它保护的是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被视为主要人权之一，而且保护人的生命是往往被认为典型的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法院在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中已指出了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险境采取行动的国家，若处于第24条第2款所规定的情况，都会这样做。因此，波兰代表团认为，不允许一国在险境是由它自己行为所致的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保护人的生命是不适当的。应该认为有关国家的行为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因此无论情况如何，仍然应排除行为的不法性。

33. 波兰代表团还对第24条的评注有点疑惑不解，因为它提到了虽然有些行为通常是私人行为者（例如船只的船长或飞机的机长）所为，但却归因于有关国家这一点。在这方面，提及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不太合适。合理的办法是，可以针对第25条第2款(b)的相应规定，提出类似的理由。

34. 此外，虽然波兰代表团支持在条款草案中采用严重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但是它对拟议的条款不十分满意。首先，它不理解为什么严重违背行为只限于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在波兰代表团看来，关于这些规范的性质和范围没有取得

普遍的一致，而且与第26条评注第5段中说明的情况相反，在国际法中没有令人信服的接受强制法惯例。第二，有许多国际法规范（如人道主义规范或外交法律），从来没有作为强制性规范被提出，但是它们对国际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应该受到适当的保护。第三，违背第41条中提出的，强制性规范所引起的后果，等于是违背国际法任何准则所引起的后果，因此，它们严重违背的不仅仅是强制性规范。第四，波兰代表团看不出，区分严重违背与经常违背委员会提出的强制性规范有什么正当理由，这主要是因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如果与强制性规范抵触则无效，不管抵触的严重性或程度。拟议的区分没有得到国际法现行惯例的支持。最后，他的代表团看不出第41条与第48和第54条之间有何明显的联系，第48条似乎指对所有人的义务，因为它承认任何国家都有权援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者的责任（因此规定了程序性权利，而不是实质性权利），而强制性规范和对所有人的义务似乎属于不同的范畴（虽然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

35. 关于条款草案第50条，评注并没有完全解答他所持的某些异议，例如，他不知道是否应把第1款(a)、(b)和(c)中使用的例子视为强制性规范的例子。如果是这样，在(c)项中阐明的国际义务就不同于在(a)和(b)项中阐明的义务，因为有关原则主要确认后者属于强制法。将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列入第1款，扩大了强制性规范的范围，将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性质规范也包括在内，这种规范以前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如果确实如此，(d)项将被视为主要相当于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4条所述及的新强制规律这一概念。问题是(d)项中使用的“一般国际法”一词是否表示只具有习惯性质的，并与有关原则相符的强制性规范。如果不是，波兰代表团建议在(d)

项中删去“一般”这个措词。

36. 波兰代表团支持关于大会应注意条款草案并将它们作为决议附件的建议，但有一项谅解，即这应成为通过一项有约束力的文书的第一步。

37. **Subedi 先生**（尼泊尔）说，这是尼泊尔代表团第一次在委员会发言，眼下的形势是，恐怖主义或其他事件接连发生，要求采取一种新的系统方法制订国际法，以便开展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和文明的进步。历史似乎在重演，这使 50 年前成立国际法委员会时提出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更加令人信服。

38. 国际法的目标应该是在国家间和世代代都提倡正义。因此必须保证在传统的国际活动领域和现代逐渐演变的活动领域，如在共同管理共有自然资源和信息技术方面，使国际法得到发展。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特别是，它已成为实现了作全球化的一种主要手段，但是却没有一项管理它的全球条约，这种情况应能促使委员会作出认真考虑，把它列为一个潜在的研究课题。

39. 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汇编涉及了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水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资源，1997 年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过，该公约没有涵盖与水有关的其他活动。关于另外一些共有自然资源的法律订得不够充分。例如，与勘探和开采这种资源有关的日益扩大的活动，这种资源将受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因为它们必须用来满足世代的需要。委员会可在这些领域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

40. 关于委员会的报告和国家责任的问题，他赞成由大会通过一项关于条款草案的决议，这将导

致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便通过一项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条约。

41. 不过，还要谈谈“严重”违背对所有的人的义务的条款草案第 40 和第 41 条，虽然委员会已明确说明了在第 40 条第(2)款上下文中“严重”一词的含义，但是它所作的定性区分在应用这些条款时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既然不会损害强制法的原则，波兰代表团希望更仔细地研究委员会所作的区分。

42. 第三部分第二章中关于反措施的规定也是这样。虽然委员会在界定根据拟议的条款草案容许采取反措施的条件和限制因素时一直非常仔细，但是波兰代表团希望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和关于解决国家间大小争端的其他原则审查这些规定。正由于联合国的使命是创建一个基于法治的国际社会，波兰代表团才希望审查反措施在一个已经建有很多解决争端机制的世界应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它应在什么程度上作好接受反措施概念的准备，无论拟议的条款草案所涉及的范围多么有限。

43. 委员会建议大会根据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的条款草案制订一项公约，波兰代表团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第六委员会工作组，来更仔细地审查条款草案。审议中的领域涉及若干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所涵盖的各种问题。委员会起草条款草案值得祝贺，但是要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把它交给大会还为时尚早。请委员会根据条款草案制订一个公约草案，随后将它提交大会通过，这种做法更为可取。

44. **Jacovides 先生**（塞浦路斯）说，目前的辩论是为了给各国代表提供机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评价，对正审议的专题发表一般意见，并

对委员会在工作中需要大会指导的问题提供答案。应该对在辩论期间各国政府口头表达的意见给予和各国答复调查表的书面意见一样的重视。特别是，小国在编写各种专题的书面意见时，必定会受到资源方面的限制。

45. 塞浦路斯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已完成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并已建议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注意这些条款和将它们该项决议的附件，以便最终考虑是否有可能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审查条款草案，并通过一项以该草案为依据的公约。

46.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塞浦路斯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已完成有关这个专题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并已建议大会在此基础上制订一项公约。塞浦路斯代表团赞扬特别报告员拉奥先生，并相信会根据该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

47.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塞浦路斯代表团注意到了通过采用关于提具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所取得的进展，它赞扬特别报告员佩莱先生所作的工作，并期待有关该专题的工作能使《实践指南》早日完成。根据委员会报告第 20 段中讨论的问题，塞浦路斯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最好别将具体涉及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列入其《实践指南》草案。

48. 关于外交保护，塞浦路斯代表团欢迎在持续国籍、索赔的可转移性和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等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赞扬特别报告员杜加尔德先生对国际法经典章节使用渐进式方法。更具体地说，

塞浦路斯代表团主要对第 28 段(b)中提出的问题作肯定的回答，问题涉及如何保护那些属于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国民的股东。

49. 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专题，塞浦路斯代表团对特别报告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表示感谢，关于报告第 29 段，塞浦路斯代表团认为，应该鼓励各国政府帮助特别报告员，对相关的国家实践调查表作出答复。

50. 塞浦路斯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分别与国际法院、亚非法律咨询委员会、美洲法律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进行了传统的信息交流。实际上，国际法院院长和成员，连同各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目前在纽约与第六委员会进行的交流，有助于在一种不同的环境下达到同样的目的。应该鼓励将这种关系作为一个手段，促进加强国际法的作用、编纂和逐步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在安全理事会一致取得了重大进展，如通过了 2001 年 9 月 28 日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这决不是偶然的，塞浦路斯代表团希望大会取得相同的成果。

51. 特别是关于委员会报告的第四章，人们普遍承认，国家责任这一专题是国际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起初，这个专题主要侧重对伤害外国人的责任，不过，强制法的制订、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该法的认可，以及《联合国宪章》中更高级规则的适用，目前已为国家责任奠定了极为广泛的基础，另外，国际法院从 1970 年 *Barcelona Traction* 一案开始承认，存在对所有人的义务，而且需要考虑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公共政策的利益。因此，国家责任已通过逐步发展的方式加以改变，委员会必须确保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国际法关于这个

专题的传统规则制订后成立的国家的期望不致破灭。

52. 塞浦路斯代表团为特别报告员就这个专题完成的卓越工作向他表示祝贺。他在起草委员会的帮助下，对案文作了更新和精简。有必要取消某些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关于国家罪行的第 19 条——，以便最后通过折中办法得出一个结论。委员会会因这个结果而受到赞扬，塞浦路斯代表团可以接受和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它承认做到尽善尽美很难，因此，在制订国际法时应尽力而为。

53. 委员会的草案中没有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确实是一个缺点。塞浦路斯代表团向来极力主张采取这样的立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所有多边法律条约中都应该列入一个全面、快速和切实可行的争端解决办法，这需要就有关的条约条款所引起的各种争端作出一项约束性决定。对塞浦路斯来说，它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它十分重视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享受公正待遇的一般原则和它作为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所享有的国家利益，这样国家需要公正和客观地给予法律保护，以便维护其正当利益。塞浦路斯还特别重视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国家责任法律制度应具备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委员会报告第 60 段已经表明，它将让大会考虑，在它决定制订一项公约时，是否列入争端解决方面的规定以及采取一种什么形式，不过，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54. 至于条款草案的形式，塞浦路斯与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一样，在去年的辩论中说明，它较赞成制订一个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公约，而且这项公约应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海洋

法公约》和最近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其他重要编纂项目相一致。不过，出于实际考虑，塞浦路斯不排除其他备选方案，但它所关心的问题应予解决，它注意到，已提出几项建议，其中包括将此专题作为一个特定项目列入大会以后各届会议的议程。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代表团可以接受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67 段中提出的建议，即大会在决议中应注意到条款草案，并将条款案文作为决议附件，但是它仍然大力支持以下立场：有关决议还应提议，考虑到该专题的重要性，大会应在第二阶段通过一项有关该专题的公约，其中包括强制性的第三方争端解决规定。这可能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但是至少这扇大门是一直敞开的。因此，塞浦路斯代表团虽有些不请愿，但仍能接受委员会报告第 72 和第 73 段中详细说明了建议，同时还接受修改该专题标题的建议。

55. 塞浦路斯代表团已注意到就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义务所表明的各种看法，并同意保留第二部分第三章和明确强调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重申的强制性规范。在这方面，一般地说，关于强制法，他提请注意 1993 年 11 月 9 日的 A/CN.4/454 号文件，该文件中载有十分相关的资料，与审议这个重要概念直接有关。此外，对“严重违背”强制性规范与不严重或轻微违背这种规范难以作出区分。据设想，违背强制性规范的情况始终都是严重的。

56. 对第三部分第二章的主题反措施应该加以限制和严格界定，因为它们易于被滥用，而损害弱国。它们的目的应该是赔偿而不是惩罚。它们应该客观地加以应用，而且应该是相称的和符合第三方争端解决规定。武力反措施与《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习惯法和强制法。

在这方面，使人回想起国际法院在科浮海峡案中所作的著名附带判词。包括人权规则在内的其他强制法规则不受反措施的损害。根据这些考虑，塞浦路斯确定了它对委员会有关这个专题的拟议的条款草案所持的立场。

57. 塞浦路斯代表团已仔细地注意到，并完全接受第四部分中阐明的对条款草案适用的一般规定。基于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第 55 条说明，这些条款具有剩余性质，如果不一致，特别规则居优先地位。评注说得对：“如果国家之间都不能规定违背相互义务的法律后果，那等于是认可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准则的行为。”实际上，强制性准则的实质内容是，它们不能受各方彼此之间协议的损害，因为那将违反国际公共政策。

58. 第 56 条说明，条款草案不是详尽无遗的，而且就未涉及的问题而言，不影响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评注中引用的例子包括非法使用武力所造成的条约无效、环境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或实际违背条约情况下的终止，这一切都来源于条约法，而非国家责任规则。第 57 条将关于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国家对一国际组织行为负责的问题排除在本条款之外，第 58 条也是一项保留条款，涉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任何人按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问题。然而，如评注正确地指出的，“起诉和惩处犯下不法行为的国家官员，不能免除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25 条第 4 款反映了这个原则。最后，第 59 条保留了《联合国宪章》的效力。评注说明，对本条款各方面之解释均应与《联合国宪章》相一致，根据《宪章》第 103 条规定的原则，如果在《宪章》之下义务与依其他任何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宪章》之下义务应居优先。

59. 根据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塞浦路斯代表团已仔细地注意到第 20 条（同意）。前一年，塞浦路斯代表团已说明，同意必须自由给予，而且应该谨慎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强制法概念的实质是，各方不能因它们之间订立的协议而损害它，因为那将与国际公共政策不一致。在关于同意问题的第 20 条草案同一范围内，塞浦路斯代表团说明，它完全同以色列代表团一样，对没有保留就强制性义务而言同意无效的例外（载于 1996 年第 29 条草案）感到遗憾。他指出，第 20 条草案的评注讨论了将同意视为有效须遵守的某些模式，并提到了“可能根本无法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的情况”，同时还相互参照了第 26 条草案（遵守强制性规范），该条适用于整个第五部分。

60. 第 26 条评注的第 5 和 6 段以及关于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的第 45 条评注第 9 段与这个方是相关的。虽然第 26 条的评注第 5 段列举了根据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53 条所述标准确认的强制性规范（这些规范涉及侵略、种族灭绝、奴役、种族歧视、危害人类罪行和酷刑以及自决权），但是没有明确提到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使用武力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侵略”一词都有可能包括或不包括使用武力，由于这个词的不确定性和安理会在这方面的作用，需要记住这一点。他还指出，第 26 条草案评注第 6 段说明，“甲国无法使乙国免于遵守强制性规范的义务[……]，无论是以条约或其他方式都无法做到。”虽然出于合法目的给予有效的同意可能是适宜的，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种同意不能使适用的强制性规范无效，也不能使根据适用的强制性规范属于非法的行为合法化。

61. 他在开始谈到第 21 条草案（自卫）时回忆说，《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如果发生武

力攻击，在安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前，一国有自卫之自然权利。因此，在此范围和限度内，采取自卫行动的国家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62. 塞浦路斯代表团特别重视第二部分第三章，这一章包括第 40 和 41 条，涉及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项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以及最近在东帝汶案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适用案中所作的附带判词已说明，就国家责任而言，某些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由于有关权利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注意予以保护。

63.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第 53 和 64 条，在确认存在实质性的基本规范后，已接受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因此，不允许损害这些规范，条约也不能这样做。塞浦路斯代表团认为，拟议的第三章是一个折中方案，它有助于终止长期以来围绕第 19 条，就国际罪行是不同于国际违法行为的犯法行为问题展开的争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特别能够表明这一点的是，在个人刑事责任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势态，例如 1998 年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塞浦路斯代表团在这一章的评注和脚注中高兴地看到，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在国际惯例、国内和国际法院判例以及法律原则中得到了承认。在维也纳条约法会议上，塞浦路斯和其他国家一道，在促使接受此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塞浦路斯代表团还提请人

们注意下述事实：审议中的报告脚注 675 和 679 表明，不论是“侵略”，还是违反《宪章》原则非法使用武力，都受到强制法的禁止。

64. 塞浦路斯代表团注意到，第 41 条规定，各国应进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制止第 40 条含义范围内的任何严重违背义务行为，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第 40 条含义范围内严重违背义务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合法，也不得协助或援助保持该情况。因此，这是一个不承认、不援助和合作制止违背义务行为的问题。塞浦路斯代表团已仔细地注意到该条款草案所附的评注和脚注，并对它们表示完全赞同。除了援引 1996 年 Loizidou 诉土耳其“案情”Turkey 的脚注 697 和欧洲人权法院在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中宣布的判决外，还应该在安全理事会对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出的反应评注第（4）段文内提请注意安理会第 541（1983 年）号决议和第 550（1984 年）号决议中同样表明的立场。同科威特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国家承认 1983 年 11 月 15 日在塞浦路斯采取的行动的合法性，吞并科威特未遂事件在随后已被纠正，而发生在塞浦路斯的这类事件却还没有纠正。

65. 关于第三部分，塞浦路斯代表团已注意到它的内容，总的说来，它同意关于具体受害国在环境允许时，在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义务的情况下援引一国责任的做法。它还注意到第二章（反措施），并提醒在这方面需要采取解决争端的程序。它注意到条款草案第 49 至第 54 条中采取的做法，特别欢迎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定及其评注。实际上，反措施不得影响：（a）《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b）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c）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d）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所应承担的其他义务。依

强制性规范所应承担的“其他”义务这一提法用在此处特别恰当，因为它清楚表明，第 1 款 (a)、(b) 和 (c) 项的禁止规定也可以作为强制性规范。此外，(a) 项十分明确的措辞说明，“《联合国宪章》中

规定的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比在评注别处对“侵略”的提法更为可取。

下午 5 时 20 分散会。